

民进党 研究丛书

民进党 社会基础研究

MINJINDANG SHEHUIJICHU YANJIU

鞠海涛 著



九州出版社

• 民进党研究丛书 •

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

鞠海涛 著

九州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鞠海涛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 1

(民进党研究丛书)

ISBN 7-80195-014-3

I. 民... II. 鞠... III. 民进党—研究—台湾省

IV. D675.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9009 号

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

作 者/ 鞠海涛 著

出 版/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 4 号 电 话/68706018

邮政编码/ 100081

电子信箱/ jiu Zhoupress@vip.sina.com

总 经 销/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各地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6.5

字 数/ 14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014-3/C·57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民进党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2000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微弱优势当选，并于5月20日上台执政。在党纲中明确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与在台湾统治50余年的国民党下台，标志着台湾政治生态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毫无疑问，这一变化也为两岸关系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投下重大变数。

近4年来，民进党当局的政策走向、执政状况如何？两岸关系深陷僵局、持续紧张的症结在哪里？有利于两岸同胞切身利益、有利于两岸经济发展的“三通”为何一波三折、阻碍重重？陈水扁及民进党当局究竟应何去何从？这些现象和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众多关心台湾问题的人士与学者的观察、思考和研究。

这套丛书共8册，多方位、多角度地透视了民进党的历史发展、组织派系、社会基础、意识形态、选举策略等，尤其是近4年来，其大陆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执政状况对台湾社会的影响等，集中展示了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当然，由于占有资料、观察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各有不同，因而每位学者的看法与结论均为一家之言。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在于为关心台湾问题的读者、学者提供学术参考。

九州出版社

2003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民进党产生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积累与政治生态的演变 (1)
- 第二节 省籍矛盾中本土化价值的提升 (20)
- 第三节 “自决”诉求的社会影响力扩大 (31)
- 第四节 党外势力的派系及其社会基础 (37)

第二章 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经济—阶级向度分析

- 第一节 民进党与大资产阶级的关系 (46)
- 第二节 民进党与中产阶级的关系 (56)
- 第三节 民进党与工农阶级和弱势群体的关系 (69)

第三章 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统独—族群向度分析

- 第一节 统独—族群认同分歧的社会特质 (79)
- 第二节 族群—统独认同与政党认同 (89)
- 第三节 民进党统独—族群认同向度的社会基础 (98)

第四章 民进党拓展社会基础的基本途径

-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政党定位 (106)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 (121)

第三节 形象—政策—能力牌的运用	(137)
------------------------	-------

第五章 民进党拓展社会基础的瓶颈

第一节 从选举数字看民进党社会基础	(149)
-------------------------	-------

第二节 “台独”意识形态的结构性限制	(154)
--------------------------	-------

第三节 民主—改革—清廉光环的渐趋褪色	(162)
---------------------------	-------

第四节 执政绩效不彰不利民进党拓展社会基础	(175)
-----------------------------	-------

结束语 沉溺悲情无助于拓展社会基础	(185)
-------------------------	-------

参考文献	(187)
------------	-------

后记	(197)
----------	-------

第一章 民进党产生的社会背景

1986年9月28日，汇集各路反国民党势力的“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在当时尚未解除党禁的情况下突然宣告民主进步党成立。这一突然结果当时不仅改变了台湾的政治局势，后来也严重影响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作为台湾第一个真正的在野反对党^①，民进党的成立是党外势力多年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奋斗抗争的结果，但从大的深层社会背景来看，民进党的产生是台湾现代化过程中各类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这其中民主与专制、省籍、统独三大矛盾构成了民进党产生的主要背景因素。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累积与 政治生态的演变

民进党的前身是被称为“党外势力”的在野反对力量。“党外”一词，原本只是对非国民党籍的一个泛称，早期台湾参与各项选举的无党籍候选人，多是以“无党无派”标榜自己，而很少用“党外”一词。从1969年黄信介、康宁祥在选举中脱颖而出

^① 在民进党成立之前，台湾早有民社党和青年党，但这两党系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实为国民党的附庸，并未发挥任何制衡作用。从这个比较意义上讲，民进党才是“第一个真正的在野反对党”。

之后，“党外”一词被广泛使用于各种场合。渐渐地“党外”一词成为那些无党籍人士中与国民党意见相悖的异议分子的代名词和标志。而正是在这个界定笼统却又简洁的标志下，一些有志介入台湾政治舞台的人士，经过数次选举的考验，逐渐汇集成一股对抗国民党的在野政治力量。党外势力在面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压迫时，其诉求是争取民主与人权，以组建反对党为目标。处于经济及社会转型中的台湾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高涨，党外势力针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一系列民主化主张，逐渐获得一些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就为民进党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民进党本身就是台湾经过一系列的朝野政治抗争而逐步走向民主的产物。民进党之所以能够顺利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国际环境变化和特定历史情势的影响，尤其是80年代中期来势汹汹的东亚民主化浪潮。菲律宾、韩国独裁统治者的纷纷垮台产生了滚雪球般的示范效应，致使地缘上相近的台湾深受影响。同时美国对台湾党外势力的支持不断暗中升温。在内外形势的冲击和巨大压力下，1986年国民党开始放松政治控制，台湾政治由此进入转型期。政治转型期的到来，为民进党的产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政治环境。

一、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弊端

国民党退台之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巩固政权，国民党通过采取种种强力措施加强控制，很快建立起专制统治，并把它固定化、长期化。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 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零时起实行全省戒严。从此，台湾进入戒严

体制，长达38年之久，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严为止。国民党当局依据《戒严法》陆续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戒严时期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等等，还有关于出入境、山海防、交通、电信等30多种法令法规条例，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仅以报纸为例，国民党实行“停登、限张、限印”的报禁政策，致使从1951年到1987年36年间没有新报纸问世。在戒严时期的军事管制体制下，宪法赋予民众的各种基本权利都被无情剥夺了。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实行戒严，借口是海峡两岸处于战争状态，为了防止“中共侵犯”，而其实主要是为了控制民众，打压反对运动和异议人士。利用这一特殊手段，国民党当局可以任意逮捕人、关押人，可以对任何威胁其统治的言行进行严厉镇压。戒严体制已成为国民党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

2. 国民党强大的政党控制力和渗透力。国民党1949年底败退台湾后，党员人数锐减，1950年底的统计数字仅为8万人。但是经过1950—1952年的“党务改造”，一般党员人数猛增到17万人。从1951—1969年间，国民党新增党员62万人。到1988年，国民党党员人数为240多万，约占台湾全部19岁以上人口的五分之一，全部男性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国民党员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行业，各业界的领导人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员。国民党把200多万党员依所在单位编成几万个党小组，党小组为党的最基层组织，往上逐级建立相应的党组织，直至中央。国民党正是凭借其庞大的党员人数和像触角一般遍及社会各行各业、阶级阶层的党小组，以及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严密控制着“政府”、军

队、社会团体及各个方面,实行“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和“以党领社”的执政方式^①,这种执政方式实际就是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同时,国民党实行“党禁”政策。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和1987年国民党开放“党禁”之前,没有任何新政党出现。尽管党外势力一直试图组建反对党,但都被国民党强力镇压掉。

3. 维持“法统”名义下的“万年国会”。国民党退台后遇到了一系列的“宪制”危机。最突出的是“法统”危机,即怎样表明仅仅局促于一个小岛的国民党当局仍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国民党必须让一起逃台的在大陆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这三种“中央民意代表”永远“代表”下去。于是,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通过抠“宪法”字眼、“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宪”等方法,使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民意代表”成为终身制的“万年代表”^②。这些终身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在国民党当局的庇护下,享受着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很快蜕变成维护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几十年来,国民党当局想通过什么法案,就可以通过什么法案,他们实际充当了国民党驯服长效的“表决机器”。“万年国会和国代”已成为阻碍台湾民众参与高层政治的严重问题,深为台湾民众所诟病。

4. 强化社会控制机制。在强大的政党控制力和渗透力之外,国民党仍不放心,通过强化军、警、宪、特等统治机器来全面控制台湾社会,尤其是警特等情治系统机构庞大且权力膨胀。五六十年代,台湾特务数量之多、门派之多足令世人惊叹。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广布眼线,并把在大陆统治时所搞的

^① 参见田宏茂:《大转型》,台北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91页。

^② 参见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第三章第二节“创世界纪录的‘万年国会’”,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

“保甲连坐”制度照搬到台湾。众多特务为了邀功争赏，无事生非，滥抓滥捕，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与特务横行相配合的是，代表社会公权力的警察，在台湾的规模和权限也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警特横行的恐怖社会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生命保障等基本权利已成为难以企求之事。

由于威权力度的不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可以 1972 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偏重强力控制，重用情治系统，坚决压制党外势力，强化一党专制。许多研究台湾问题的西方学者称之为“强硬威权主义”。蒋经国统治时期，台湾经济实现起飞，蒋经国重用财经官僚，在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逐渐改善，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治控制，对党外势力也展现出一定的宽容。但是，戒严体制和“党禁”政策仍然维持，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没有改变。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软性威权主义”。

整体而言，在民进党成立之前，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的威权主义统治，使得“宪法”赋予台湾民众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各项权利受到压制，甚至被剥夺。这就无可避免地使以民主化诉求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反对运动不断兴起。民进党产生的岛内主要政治背景即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

二、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发展和变化，因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下去的最基本要素。经济活动也是最活跃的，因为人类改善自身存在条件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活跃的因素，经济的发展和变

化必然带动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变化和发展,其中直接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变动,进而影响政治层面的变化。台湾学者萧新煌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国家结构”是“软性威权主义和强制性发展主义”。即在政治层面维持一党专制,在经济层面实行官方主导与民间结合的高速发展^①。

从1949年国民党退台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在近40年的时间里,台湾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是1949年至195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第二是1953年至1963年的进口替代时期,到60年代初期,岛内主要工业消费品基本上实现自给;第三是1963年到1973年的出口扩张时期。这一时期台湾开始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出口工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整个台湾经济的“起飞”。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创记录的两位数,台湾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彻底改变了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结构,工业产值比重大幅超越农业,工业就业人口也大幅增长,台湾社会已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第四是1974年至1986年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是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农业产值和就业人口进一步减少,第二和第三产业继续增长,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明显增长。

台湾经济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在80年代中期已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经济总量大幅提高。1952年至1986年的35年间,全台生产总值从16.6亿美元增加到740.8亿美元,增长了44.63倍。在亚洲地区,其增长率仅次于日本。人均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205.5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3748美元。1986年底,台湾

^① 萧新煌:《对“台湾发展经验”理论解释的解谜》,台湾《中国论坛》第31期,1989年1月,第164页。

“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超过联邦德国和美国，达 46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1987 年，台湾的出口总值达到 535 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 11 大出口地区。1985 年 2 月 27 日，台湾“经济部”宣布台湾已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二是产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53 年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台生产总值的 38.3%，而工业、服务业分别只占 17.6% 和 26.8%。1985 年，农业在全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为 7%，而工业产值的比重则升至 45.2%。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17.5%，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分别升至 41.6% 和 41.1%。下表反映了台湾产业结构和就业人口变动的基本趋势。

台湾各类产业生产总值及就业人口比 (%)

年 份	农 业		工 业		股 务 业	
	占总产值	就业人口	占总产值	就业人口	占总产值	就业人口
1953	38.3	55.6	17.7	17.6	44.0	26.8
1955	32.9	53.6	21.1	18.0	46.0	28.4
1960	32.8	50.2	24.9	20.5	42.3	29.3
1965	27.3	46.5	28.6	22.3	44.1	31.2
1970	17.9	36.7	34.7	28.0	47.4	35.3
1975	14.9	30.4	39.2	34.9	45.9	34.7
1980	9.2	19.5	45.0	42.4	45.8	38.1
1985	7.0	17.5	45.2	41.4	47.8	41.1

资料来源：1986 年台湾《统计手册》(英文版)。

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就业人口结构的大幅变动，必然导致了以阶级阶层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剧烈变动。从战后到 1986 年民进党成立时，台湾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出现很大的变化。

第一，地主阶级的瓦解。1949年国民党退台时，台湾是一个以乡村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掌握了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地主士绅阶级，不仅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而且也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为了解决国民党退台后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缓和农村阶级矛盾，解除地主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威胁，国民党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借鉴共产党搞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从1949年到1953年，在台湾农村大张旗鼓地渐次开展了以“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随着地主阶级对大部分土地所有权的丧失，台湾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解体，农村地主阶级迅速瓦解，并从此没落下去。自耕农逐渐在农村中占优势地位。地主阶级的瓦解和乡村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国民党得到了多数农民的支持。

第二，大资产阶级的崛起。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崛起的是大资产阶级。经济上，大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当局的扶植下，迅速成为岛内一支重要力量；政治上，大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逐渐占据了地主阶级消失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并和国民党结成联盟，构成了政商结合的利益复合体。由于国民党无论在地方还是“中央”层级，都愿意吸纳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参与政治，使大资产阶级获得了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政治地位。所以，大资产阶级是国民党经济、政治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自然成为国民党统治的阶级和社会基础。由于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结盟关系，大资产阶级对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党外民主化运动敬而远之。尽管进入80年代以后，大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因官僚资本控制着工业基干部门和金融机构而产生一些裂痕，但整体而言，他们不支持党外反对势力，因而不是民进党产生的社会基础。

第三，农民阶级的衰微。国民党通过土地改革，成功地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使得国民党在五六十年的统治比较稳固。但是，随着台湾经济在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工业化，台湾已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最明显的特征是台湾城市化速度快，程度高，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1985年，农业人口占当年总人口的21.5%，占整个就业人口的17.5%。农民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整体上衰微是现代工业社会必然发生的现象，可以说，农民阶级是台湾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力量。1986年，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有87%的农民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说明日益衰微的农民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小农阶层，仍是国民党的一支重要支持力量。由于传统上对国民党的支持和自身的保守性格，以及地缘因素，农民阶级并不关心党外反对运动，不是民进党形成的社会支持力量。

第四，劳工阶级的壮大。台湾劳工队伍在50年代初期人数很少，大约为50余万。但是随着台湾五六十年代快速的工业化，到1969年，劳工人数急速上升到115.5万人。至1976年，仅产业工人就占总劳动人口的36%，若再加上服务业工人，则达到50%多^①。截止1985年，工矿企业等生产部门的工人200余万，加上其他各行业的员工共计404万人，占当年就业人口的54.36%，是台湾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台湾劳工阶级不仅遭到资方的剥削和压制，而且还受到国民党专制体制的严密控制。国民党政权退台后的戒严体制严禁工人罢工和任何集团性活动，明令规定30人以下的工矿企业不得建立工会，同时用官办工会控制工人。在戒严时期，劳工的任何集体反抗行为都会被扣上影响

① 许嘉猷：《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85页。

社会安定、破坏生产秩序的罪名，遭到军警的镇压。7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民党当局和资方的双重压制下，台湾的劳工运动始终处于“冬眠”状态。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劳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一代劳工开始出现，其受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明显高于保守温顺的老一代劳工，他们的自我阶级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与日俱增。这就导致以劳资纠纷为主要内容的劳工运动开始萌发，并在8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

面对数量庞大的劳工队伍，无论国民党还是党外势力，都想加以控制和利用。国民党改变一味对工人反抗采取压制和打击的作法，开始重视劳工的利益和要求。80年代初，国民党借“劳动基准法”的制定，向劳工阶级示好。党外势力在70年代就意识到劳工阶级是可资利用的社会力量。早在1977年底的台湾地方5项选举中，党外势力作为一个团体（即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第一次发表12条共同政见，其中4、5、8条的内容分别是：“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废除保障资本家的假保护企业政策”、“制定劳动基准法，励行劳工法，承认劳工对资方的集体谈判权”。由于民进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工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民主意识较强的一些劳工尤其是青年劳工，以及那些受压迫较深的劳工纷纷投入到支持党外反对运动的阵营中。因此在台湾两大政治力量的对抗中，劳工阶级过去一直被国民党控制的局面开始改变。1986年的一项选举调查显示，国民党在劳工中的得票率仅为44%，反对党则为51.6%。这说明，在民进党成立的社会背景中，劳工阶级已成为支持党外势力的有力外围力量。

第五，中产阶级的兴盛。中产阶级介于大资产阶级和工农大众之间，其组成成分比较复杂，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中小资产阶级，即传统中产阶级；一类是以知识

分子阶层为主体的新兴中产阶级。台湾学者通常将台湾的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合称为“中智阶级”。台湾中产阶级具有流动性强、思想活跃、引领社会风潮等特点，且数量巨大，约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中产阶级不仅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而且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

新兴中产阶级和传统中产阶级因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的不同，在民进党成立的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60年代，台湾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现代社会。在资本扩张期，由于岛内市场狭小，很快被官商和大财团独占，中小企业难以发展起来。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达国家为了提高竞争力，让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少，资本回收快，宜于中小企业经营。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台湾当局借机鼓励和疏导中小企业向海外市场发展，台湾外向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达到80万家，约占台湾企业总数的98%以上，就业人口占就业总数的75%，产值占总产值的60%。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繁荣了台湾经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对减少社会摩擦、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成为台湾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奠定了中产阶级的基础。中产阶级创造了奇迹，聚集了可观的财富，但是在经济上遭受到官僚统治集团和大资产阶级的排挤，政治上也由于前二者的结盟关系而受到排斥，成为政治“边缘人”，在台湾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毫无地位的状态。但是，当他们的经济实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具有了资产阶级初期那种积极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特权，争取自身政治、经济权益的强烈愿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价值规律又给了他们不断